

陕西少数民族丛书

清代同治年间 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冯增烈 李登弟 张志杰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在陕西回民起义（清代同治年间）学术讨论会上 的讲话（代序）·····	白寿彝（1）
关于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时期的主要社会 矛盾问题·····	韩 敏、邵宏谟（4）
清咸同年回民起义评论·····	李松茂（23）
从陕西回民起义的复杂原因看其性质与特点 ·····	陈崇凯（36）
略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	吴乃华（54）
试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复杂性·····	杨东梁（67）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民族斗争性质 ·····	欧阳跃峰（80）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刍议·····	李登弟（98）
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必然性 ·····	马士年（106）
陕西回民起义原因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 ·····	吴永涛（122）
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辨析·····	刘永恩（131）
清朝同治年间北疆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 ·····	马寿千（139）

试论陕西回民起义军在西捻军东渡黄河过程中的	
作用·····	拓 荒(149)
清代陕西回民起义同太平军、捻军、李蓝义军的	
关系·····	王宗维(158)
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义·····	王金香(174)
同治时期陕西回民起义中回汉人民的联合斗争	
·····	朱崇礼(187)
试论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	
·····	张克非、张二京(196)
略论白彦虎历史评价问题·····	马汝珩(204)
白彦虎散论·····	冯增烈(215)
白彦虎“叛国投敌”说辩诬·····	喇秉德(233)
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崔伟·····	冯钧平(250)
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军期间是否有出兵新疆的意图	
·····	何玉畴、邓 辉(268)
陕甘回民起义是正义的·····	陈景富、白 炎(278)
〔附录〕	
关于白彦虎在新疆活动情况的调查	
·····	马彦虎(289)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论著、资料	
索引·····	肖克芬(301)
后记·····	(315)

在陕西回民起义(清代同治年间) 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代序)

白寿彝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兄弟姊妹们：

首先，我祝贺会议的召开，预祝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几年，我因眼睛不好，行动不方便，许多这样的学术会议我应该参加的都没能参加，很感不安。今年五月间，我眼睛做了手术，视力好转一些，但还是在休养阶段。会议给我机会，让我通过录音跟同志讲几句话，我很高兴。

西北回民起义，是回族史上的一项重要问题，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很应该研究，很值得研究。讲这个问题，我谈不出很新的见解，只是想一般的谈谈资料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问题。

研究西北回民起义同研究别的历史问题一样，都要从资料的搜集入手。我们的问题是，资料的搜集工作做得还不够，官方的记载比较多，民族内部的记载、民间的记载比较少。在十年动乱期间，这方面损失就更大了。但是资料工作不是不能做了，而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第一，官书还是要利用的。官书份量很大，尽管里面有虚伪和捏造的地方，但是把许多材料对比起来看，可以发现问题，也可以看出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我认为，那部大官书，即《平定陕甘新疆方略》，还是可以利用的，因为材料相当完整，次序排列也非常清楚。这部书还是值得我们下功夫的。拿这部书同档案和实录对比起来看，会发现很多的问

题。我建议能够下点功夫，以《方略》为主，把这三个方面的有关材料系统地、集中地整理出来，这是一项很需要做的工作。

其次，清朝廷官僚有关这次起义过程的著作，也是重要的材料。民间的材料，我们自己记下的东西不多，搜集搜集还是可以有的。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材料集中起来，需要同志们花费大力气，联系各方面的人。地方志中的有关材料也比较散，但有的也很齐整，也可以抄录出来汇编在一起。

第三，在苏联方面的有关材料和记载，也要想办法联系、搜集。白彦虎在新疆最后失败，领了一部分人到伏龙芝去了，现在成为苏联的少数民族。他们有两个地方，营盘和百粮川。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东干回族朋友到我们这儿来，他们也有研究单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外国著作里边，英文有关材料也是有的，这些年我们还是注意得很不够。把各方面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官方的、民间的、汉族人的、回族人的、中国人的、外国人的，都集中起来，材料数量还是可观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进行得很好。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民间材料里有很多是传闻的，传闻的材料难免辗转失真，但也有好的材料、宝贵的材料藏在里边，需要我们发掘，我们既不能轻易丢弃，也不要轻信。这是关于资料工作。

关于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条件很好，不受任何框框限制，有些问题可以重新考虑。首先，要把回民起义的历史过程弄清，否则无法进行研究。这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要有全局的观点，从全中国的发展形势看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不会拘泥於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从全局出发的同时，要进行具体的研究，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进行研究，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进行研究。对领导人物也不能一概而论，也要具体地研究他在整个活动中间的作用及其前后不同的变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把历史本来的面目弄清楚，不是算老帐。弄清历史，从历史

上汲取经验，我们在今天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十分重要的。我还想重复一句，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研究放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去研究，这样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个工作是艰巨的。

很难得有今天的这样的盛会，想各位同志都带来了不同意见材料。我希望这次会议能促进这个问题研究的开展，同时也希望这次会议对西北地区回民起义的讨论，能带动整个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发展，能够有利于中国通史研究工作的发展。

最后，我还想附带说一下，从近年的学术工作中，特别是在我们民族史的工作中，我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研究问题，泛泛研究的多，深入地、系统地、以民族问题作专门工作进行深入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有训练的、有比较充分修养的更少一些。希望以后能改变一下这个局面。希望同志们能共同努力，把我们民族的文化学术水平早日提高上去，这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对全国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谢谢大家！

1987.9.8 （刘雪英整理）

关于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期 的主要社会矛盾问题

——再论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

韩 敏 邵宏谟

关于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问题，史学界看法分歧，而分歧的根本所在，是对当时陕甘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不同。把回汉两族人民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者，则认为这次起义是“回汉仇杀”，“一切汉人都成了打击的对象”；把回汉两族广大人民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者，则认为这次起义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本文试对当时社会矛盾作一些分析，讹谬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根本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同治初年陕甘的回民起义，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战后，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疯狂地侵略中国。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使大量的失业者流浪社会，直接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白银大量外流，使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阶级为了支付巨额的赔款和满足腐化生活，更加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纷纷滋事”。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全国人民反抗斗争高涨的情况下爆发的。这说明，战后就全国范围来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陕甘回民起义前夕，陕甘社会矛盾的表现又怎样呢？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陕甘地处西北，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没有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践踏，但这次斗争对陕甘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战争期间，从陕甘调往海防前线直接抗击英国侵略的部队，共有一万多人^①。陕西还支援了抬枪、抬炮、火药和铝斤等大量军需品^②。在财政经济上陕西不仅调拨“盐课”专款以济军需，而且还在“绅民”捐输海防经费的名义下，捐资了一百多万两。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向各省强行摊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原为清朝饷源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太平军占领，以致清政府“财源日竭，收入顿减”。为了筹集大量经费镇压太平军，加紧向北方各省的压榨，于是全国的赋税重担，便由东南转移到了西北各省，特别是陕西。据《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两省接济”^③。陕西算是西

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李文恭公奏议，卷3。

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李文恭公奏议，卷37。

③《清实录》咸丰四年二月。

北较富庶的省分，因之对陕西饷银的调拨更为频繁。每月除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必须筹银五万两解安徽杨需军营，五万两解湖北胡林翼军营，三万两解湖北督署，这些已成为定例。此外，还有甘肃十五万两，与川、晋三省合调贵州二十七万两，加拨胡林翼军营及湖北督署各三万两的临时调拨^①。正如严树森所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又为菁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省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②因此，陕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

西北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税相继繁兴。道光年间，陕西每正赋一两，所加“正耗”、“平余”达一两五、六钱。咸丰年间，更巧立名目，摊派重迭，成为定例者就达60余项之多。“平余”之外，还有火耗、解费、票费、单费、催粮等等“小平余”的勒索^③。租种官田（即屯卫田、更名田）的佃农，得向官府交“本色”或“折色”。交本色的，官吏对他们有样粮、土粮、余粮的剥削；纳折色的，也有牒价、片价等陋规。^④1853年，清政府又下令陕西预征1854年的钱粮，数额为160余万两，而五年钱粮，四年接征，依次按年递推。^⑤就这样，仍不能支付陕西所负担的数百万两军费，库藏空虚，难以撑持，于是1858年巡抚曾望颜仿效南方各省开始征收厘金，在省城设立厘金总局，在沿边交界广设局。初开办的数年，每年收款约在20万至25万两之间，以后逐年增加。在沉重的厘金盘剥下，商路阻塞，致使物价高昂，农民、市民生活贫困异常，陕西经济大为凋敝。

①《清实录》咸丰五年。

②《续修陕西通志稿》卷201，第37页。

③《续修陕西通志稿》卷26，第1页、第5—7页。

④《续修陕西通志稿》卷29，第1—2页。

⑤《王文勤公奏稿》卷5。

甘肃地瘠民贫，灾重而多，但科赋不减且过收成。“每地一亩，大熟之年仅收籽粒三斗，以三年之获，卖银三分，而完五分六毫七丝三忽九微八纤之正供”^①。除正赋以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有“日捐月捐已不堪，飞捐黑捐尤可叹”的记载^②。例如，每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五斤以至六、七斤。同时，官吏多方朘剥，每于催科之内巧立滥取之名，种种陋规，指不胜数，大致收获之所得。“纳于仓者十之二，入于民者十之二，而中饱于胥役之溪壑吞噬者且十之六矣！”^③。“民穷彻骨，求生乏策”^④，“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⑤。

陕甘的差徭负担更重。陕西与、川、楚、豫、甘交通，甘肃地处新疆西藏要道，新、藏有事，则陕甘差徭繁兴。但在咸丰以前，所有兵差还都是临时性的，自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以后，陕西境内军务活动增加，临时差徭成了固定兵徭，各县普遍设立役局，年年月月差徭不断。后来兴办团练，人于民又要负担团练之差派。差徭分“兵差”和“流差”，兵差按粮摊派，流差按亩摊派。据统计，陕西每年负担的差费可查者就不下一百余万串。“兵差”和“流差”（亦称为红差）为正差，此外还有许多额外浮派、无名中饱、乘间勒索的“黑差”，如差役的酒筵费、馈送费、过路礼等名目，索银数十两数百两不等^⑥。

甘肃东西两路，自陕西达关外，道所必经，差务络绎，承平时民力已不可支。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

①傅宏烈：《请免庆属钱粮第一疏》，《甘肃通志》卷17。

②《甘肃通志》卷39。

③《甘肃通志》张炜：《兵车行》，甘山道胡某：《厘剔催科碑文》。

④《甘肃通志》卷17。

⑤《甘宁青史略》。

⑥《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0，第2页。

杂差仍不得不借民力。“按丁苛敛，今日收去，明日又派，百姓输纳什徭几无暇日。”^①差徭之累，在西北以地瘠民穷的“甘省为最”^②。

沉重的封建剥削，已使陕甘人民无以为生，加之道光、咸丰年间陕甘灾情严重，水灾、旱灾、蝗灾、风灾、地震、冰雹相继发生，瘟疫流行，庄稼薄收。陕西饥民流徙满路，有的逃往南山，结伙掠食；有的吊死在树上；有的投水跳崖而死。未逃走的人家，有的关门等待饿死，有的煮乾瓜皮、野菜糊口，被迫卖妻子儿女、抛弃婴儿的不可胜数。和陕西一样，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由于苛捐杂税繁兴，“同治初年，兰州一隅已经发生了饿殍载道，人人相食的现象”^③。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陕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不断爆发，几乎“每岁皆有，无岁无之”，“或一岁数次”^④。其影响较大者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大荔杨村一带，有饥民近百人，皆以白布裹头，手执火把，用炭块撞开朝邑县境一家炭场之门，缚执主人，夺取钱财^⑤。

道光末年，渭南回民马殿魁领导回、汉农民反抗官府苛捐杂税，被官府逮捕杀害，焚其家产^⑥。

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汉族农民反抗官府按“地亩摊派”捐款，向县府交卸农具，队伍途经仓头、苏村、拜村，各村回民亦执农器参加^⑦。

①王金文：《详文》，《甘肃通志》卷17。

②《谭文勤公奏稿》卷12，第12—22页。

③⑤《上护院相至查大人言救荒书》，《相阁文欽》卷6。

④徐法绩：《陕西回民械斗情形疏》，《续修陕西通志稿》文徵。

⑥《秦陇回务纪略》卷1。

⑦《关陇思危录》卷1。

咸丰十年（1860年），宝鸡虢镇商民聚众拆毁土行，反抗重收厘税，陕西巡抚派兵逮捕为首之人，镇压了这次反抗斗争①。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汉民杨生华领导农民反抗官府“地丁加耗”，展开武装斗争。渭北方圆四、五十里的农民两万多人响应，参加斗争，抗击官军。临潼回民也不断派人来与杨生华联络，欲共图大规模起义②。

在甘肃，据《甘肃通志》记载，由于官府“勒令再捐，以致激变”的事亦不时发生。

以上反封建斗争的事实，不仅说明当时陕甘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回汉农民群众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且在反对共同敌人中，回汉人民能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据记载，在回汉杂居区，由于长期以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互相结亲，有的结拜为兄弟，有的还互相盟誓，“生则同吃，死则同莹”③。因此，回民起义前夕，陕甘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更不是回、汉人民的矛盾。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回民起义前夕存在回、汉矛盾的事实，和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蓄意制造民族纠纷，挑拨回汉关系，甚至煽动械斗。但这种现象，并非同治初年所独有，如咸丰八年（1858）年，临潼回汉械斗，回民被汉民殴打，回民不服，“纠众数千人赴汉村私斗，互相杀伤”④，规模之大是少见的，但当时并没有激起起义。这说明回民和汉民的矛盾，并不是当时陕西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不是回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同时，太平天国后期，东南革命形势恶化，但在西北，特别

①《十朝东华录》。

②《缪树本传》，《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

③西乡县城外常、马二氏合莹碑文。

④《临潼纪事》《回民起义》三册。

是陕西由于封建剥削的空前加重，阶级矛盾急剧激化，革命形势则不断高涨，再加上清军力量薄弱，所以在西南、东南的革命势力，都向陕西一带涌流。1862年初，川滇农民起义军余部蓝大顺、邓天王、曹灿章、蔡昌龄（蓝二顺）先后分路由川入陕，活动在陕南的汉中、安康、商雒等地。为了挽救东南形势，陈玉成命陈得才、赖文光远征西北，以图“广招兵马”。5月，太平军抵西安城南的尹家卫，大败清兵，遂围西安省城，这两支起义军隔秦岭遥相呼应，分别在关中、陕南展开反清斗争，把陕西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陕西的回民起义，就是在太平军入陕、陕西反清斗争高涨的革命形势下直接爆发的。是陕西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二

列宁说：“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别一个阶级的斗争。”^①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也正是回民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对立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他们不堪忍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反动的民族歧视，于是就采取武装斗争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部过程，正是这种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的表现。

回民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起义初期，主要表现为回民反对封建地主团练的斗争。

同治元年太平军进陕后，清王朝“诚恐回民乘机蠢动”，多次紧急谕令陕甘地方政府对回民“密为防范，毋令反侧”^②。因之陕甘各地城镇乡村多组织团练或民团，以防守城寨或围剿回民

^①《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页。

^②杨凌霄：《陕西被兵记》（稿本）。

起义军。如陕西渭南团总冯元佐招募团众万余人，编成十五营，配合清军作战；西安郊区团总梅锦堂、石仓屯驻西关金胜寺，协助清军守城；凤翔“汉民村庄皆练团募勇，团众不下数十万”。而甘肃团练如“宁郡一城而言，众逾十万”；狄道团练，“数日间，得众万余人”；陇西团总李耀荣，也纠众万余人，称之为“海团”。

各地地主团练在清朝地方政府的直接指使下，四处散发“秦不留回”的反动传单，疯狂屠杀回民，妄图一举把陕西回民斩尽杀绝。甘肃省宁夏、狄道、陇西、凉州、盐固等地的地主团练，也血腥屠杀回民。这样就引起了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的爆发，地主团练一时就成为回民最凶恶的敌人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怎样认识回民与地主团练之间的斗争性质呢？主张这次起义性质是民族斗争和回汉仇杀论者，认为地主团练与回民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回汉两族的民族斗争。他们说：“汉族地主团练始终被这次起义列为首要打击目标，”“几乎一切汉人都成了打击的对象”，因而，“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①。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汉民参加地主团练的现象，没有揭示地主团练的反动阶级本质。地主团练不代表汉族人民，也不反映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它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回民的工具。地主团练这种反动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地主团练是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指令下建立的。同治元年，太平军进陕后，清政府为了维持他的反动统治，任命泾阳县在籍左副都御史张芾为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同时各府、州、县的官吏和绅士也被委任举办地主团练。各府、州、县官吏奉札举办团练的事例，俯拾即是。富平县知县江开奉檄招募勇丁，他会同

^①何玉畴、吴廷桢：《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性质》，《西北师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在籍前户部员外郎郭浚等，一面招募练勇，一面亲历各乡劝督民团，联络堵御。他以地丁银二万两，募练勇千名，“是以富平练勇甲于各县”。凤翔也分别成立府团和县团，望绅郑士范由清廷钦派分办陕西团练事宜，又受陕西省巡抚瑛藻委派督办府团。凤翔县令等由巡抚委派筹办县团。郑士范亲拟章程，制器械旌旗，一切如绿营之制，成立起了城团。四乡村镇，由郑士范和县令亲自巡视各处，督令“照城团自练”^①。户县县令沈公淦奉檄办团，委派邑绅张源沔为绅董长，募勇制械，督饬训练，防守县城，四乡则用前明吕令张公遗制立十三操（划邑境为十三区，各立团练）。陕西长安、临潼、蓝田、高陵、三原、渭南、泾阳、华阴、华州、韩城、乾县、礼泉、永寿、岐山、千阳、米脂等县，概都奉札办团，几乎所有州县都举办团练，无一例外。甘肃各府、州、厅、县也纷起办团，阻挡起义洪流。巩秦阶道林之望谕民起团自卫。陇西也于“同治二年，因陕回乱，各堡寨奉文办团”，全县东南西北四乡分段设四团。宁夏郡城，巡道侯登云设民团防城，昼夜戒严。泾州、岷县、通渭、古浪、盐茶厅等县，亦奉命立团。因此，团练之兴，完全是在清朝地方政府的指令下举办的，绝对不是汉族人民自发的抗回武装。

第二，地主团练直接受地方官吏控制和指挥。陕西巡抚瑛藻在告示中说：“回系匪，宜剿灭，汉系团，宜协同官兵剿回。”^②陕西各地地主团练在官吏的指挥下疯狂围剿回民。例如，同治元年八月，永寿县令“密令民团剿杀回逆”。千阳县县令“督率各团堵御回逆”。有的团练还受清朝调遣赴外地协同清军作战。多隆阿札饬渭南团练头目冯元佐，募勇讨回，并赏给他五品顶戴，允许他驻扎北山各要口，归提督雷正綰统帅。冯元佐招勇万人，多次被调三原等县镇压回民起义。后来雷正綰又命冯元佐带勇三千赴甘

^①郑士范：《旧雨集·忠义》。

^②《秦难见闻记》，马霄石：《西北回民革命简史》，第104页。

肃防守庆阳，并分兵赴环县、泾州助剿。1863年，甘肃巩昌府赵某、狄道举人张椿龄，招募民团，因用黑布缠头，称为“黑头勇”，后由左宗棠委泾州都司范铭统帅，在南路七州县一带助剿。

第三，从团练的组织成分看，其头目及骨干分子多系地方官吏、地主士绅和有科举功名的地主知识分子。《三原县新志》记载：同治元年回民围攻三原县城时，参加城防的团练有“英烈、英雄、英武、忠义、安吉、太平、恭武、三义、威武、得胜诸名。领团首事则举人王襄、武举方国柱、岳震川、武生牛振海、举人相里捷、生员侯宝三、武举牛捷之、生员张彦善、贡生管鸣生，生员张振刚、武举杨逢春、军功王宝三、武生惠登云、潘恩宽、州吏目刘继芳、从九品翟学安、张彦彪、张万鹏、武承翰、武生郝起腾、李廷佐、武生郝起垫外，委马得喜及邑侯长公子余作宣、四公子余□□、长公孙余安国、次公孙余安定督之”^①。再如《平回志》记载：“自回祸起，荔渭各团长死难者：县丞刘藩、刘炯，同知刘炳、训导陈大本、岁贡唐凝绪、唐义衡，生员陈洪范、参将赵锡祺、监生杜朝选、崔文采、崔文兆。孝义镇则拔贡严鑫、廪生赵申中、生员赵绍德、监生赵汝及、廪生吴阶、从九品吴天成、云骑尉乔同雯、监生同步霞、从九品王生葵等。”^②回民起义猛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秩序，严重地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各地地主士绅的仇视，他们便积极组织团练协助地方政府围剿回民。地主士绅是团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四，从团练的经费来源看，地主富商是团练的主要经济支持者。团练耗费巨大，其经费除向人民勒索和抢劫之外，主要是依靠地主富商捐款支撑。渭南团练头目冯元佐，得到同官富户梁三藏五百万缗巨款后，才募勇万余人，东山再起。三原县城内地主张潜的姐姐（郎中胡砺铎母）捐银五万两，资助团练守城。富

^①《三原县新志》卷8，《杂记》。

^②《平回志》，《回民起义》（3）第62页。

商张绳怡、刘维均表兄弟，倡议富商捐款，集资一万两，成立了同德局团练。余庚阳《池阳吟草》中《义捐》一首写道：“裹粮未可久操戈，贼饱兵饥奈若何？众志成城须犒众。多钱善贾果哀多，字标十万麻家贯，赏给三千壮士歌。”①回民起义时余庚阳为三原县县令，他组织团练抵抗回民。《义捐》正反映了三原县城内地主富商筹款支持团练守城的事实。盐茶厅（海城县）署同知屈升练土勇四千，“饷需由本地富户供给”②。所以，地主富商是团练的主要经济支持者。

官吏、地主士绅、富商相依为命，互相勾结，组织地主团练，围剿回民起义军，所以团练从其建立、组织成分、政治目的和作用来看，都是封建反动武装的一部分，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回民与地主团练的斗争，不是回汉两族之间的民族斗争。

陕甘办团始初，先不分回汉。例如陕西的风翔府、渭南县及甘肃的岷州等地的团练都有回民参加。起义爆发后，团练的参加者则完全为汉民。能否根据汉民参加团练的事实，说明地主团练与回民之间的斗争性质是回汉两族的民族斗争呢？当然不能。因为战争的性质不取决于敌对双方军队士兵的成分，而是由敌对双方政治集团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什么王朝的军队和反对封建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他们都是由农民组成，近代的民主革命也不例外，所以不能由汉民参加团练而得出这次回民起义是“回汉仇杀”或“民族斗争”的结论。

回汉两族劳动人民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汉民参加地主团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没有自主权、完全受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和支配的结果。例如陕西米脂县知县强迫汉民参加团练，知县逐户搜寻花丁，并将花丁逐一按口贴名防城，“贫富一例上

①余庚阳《池阳吟草》。

②《海城县志》卷10，《艺文志》。